

古白話專書研究的一個楷模

——評《〈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彙研究》

徐時儀

專書詞彙的研究在漢語詞彙史的研究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詞語的考釋無疑是詞彙研究中的基礎工程，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沒有一批重點專書詞義的窮盡性分析，沒有斷代詞彙的總體特徵的研究，個別詞語的考釋成果祇能是一盤散沙，難以理清詞義發展演變的脈絡，勾勒出漢語詞彙的體系。因而，反映各個歷史時期詞義面貌的專書詞彙的研究可以說是探求漢語詞彙在各個時期的特點和總結漢語詞彙發展規律的不可或缺的工作。祇有一本書一本書地認真進行專書詞彙研究，對第一手語料進行一絲不苟的調查分析，加以科學的歸納和理論上的闡述，在此基礎上一個時代一個時代地理出詞彙歷史和邏輯統一的发展脈絡，纔有可能從總體上把握漢語詞彙的本質特徵。

古代漢語有兩個書面系統，即王力先生在《古代漢語》緒論中所說“一個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以及後來歷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語言，也就是通常所謂的文言；一個是唐宋以來以北方話為基礎而形成的古白話。”^①大致說來，先秦到西漢的文獻語言基本與口語一致，東漢以後逐漸形成言、文分離的局面，書面文獻也漸分為兩大系統：一為以先秦到西漢文獻語言為模仿對象的文言系統，一為以當時口語為基礎的古白話系統。這兩大系統也就是呂叔湘先生（1983：67）所說的“超

語體文”與“語體文”。古白話這種語體文萌芽于漢魏，成熟于晚唐五代，處于上古漢語和現代漢語的中間狀態，反映了漢語由文言到白話的古今演變，在漢語史的研究上具有特殊的價值。近年來一些古白話專書研究的成果相繼問世，其中董志翹先生（2000）《〈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彙研究》（下簡稱《研究》）就日僧圓仁所撰《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下文簡稱《行記》）一書的詞彙作了全面系統的研究，填補了漢語史研究中的一個空白，可以說是這方面研究的一個楷模。筆者不揣謏陋，謹就此擇要略作評述。



研究語言，首先是資料的選擇。選擇研究漢語詞彙的專書，首先要確定所選書的成書年代，作一番辨偽的工作；其次要衡量所選書的語言反映當時口語的情況，第三，所選書的篇幅要有足夠的語言容量，以便對各種詞彙作較全面的描寫和分析。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是日本僧人圓仁遣唐期間所撰日記，全書分為四卷，始于承和五年（838）六月十三日，止于承和十四年（847）十二月十四日。此書基本上是語體文，比較接近其時口語，可以說此書中的口語詞是目前能見到的同時代文獻中最可靠和最切近語言實際的材料之一，在研究晚唐時期的詞彙和語法方面頗有參考價值。此書撰寫年代明確，不但可以精確到年，還可以精確到月和日，這是一般語料所不具備的。書中有不少新詞新義皆早于目前大型語文工具書所收相應的用例。由于作者是外國人，又是在巡禮途中逐日寫下的日記，所以書中的口語基本上是以“實錄”的形式記載下來的。作者接觸的對象大多是下層官吏、普通僧侶、平民百姓，所以其記載的語言有時甚至比與其同時代的敦煌變文、禪宗語錄還要通俗，有些詞句幾乎與現代漢語

毫無二致。作者求法巡禮的足迹大致在長江以北的北方方言區，因而其所記口語的地域性也是比較單純和明確的。志翹先生憑藉其淵博的學識和扎實的語言功底，從汗牛充棟的歷代典籍中選擇《行記》進行專書詞彙研究，作為中古詞彙史研究的突破口，可謂慧眼識寶，而古白話文獻中的這一瑰寶亦幸得其研究之人矣。

志翹先生多年從事訓詁研究，長于考證。其所撰《研究》一書十分注重語料的可靠性，力求使研究所得的結論建立在扎實的基石之上。從《研究》一書幾乎觸目皆是的考證中可見其差不多考察了現存于世的每一種《行記》的版本，參閱了國內外有關《行記》的二百多種研究論著，在此基礎上對《行記》作了精審的校勘，糾正了有關此書校注中的一些失誤。如：

苦囑云：“若到登州得停泊，即將書請來。未間，在長意檢校，勿令漏失。”（卷四，會昌五年七月五日）

指出“未間”是唐宋時的習用語，即“未……間”的凝縮形式，指前述情況未實現之前的一段時間。當“未……間”中的動作行為前文已有交代時，為避免重複，後文可徑言“未間”，此類用例中古觸處可見。可是，《行記》校點者似未明“未間”之意，顧承甫、何達泉校本全將“未間”屬上斷句，遂致不知所雲。《校注》^②本則斷為“苦囑云：‘若到登州得停泊，即將書請來。未間在，長意檢校，勿令漏失。’”并加注云：“[未間在長]小野認為，‘未間’是‘未達一間’的略語。此句的意思大約是：可能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能通訊。也可能連下句，作‘未間在，長意檢校’……”其實，這兩種斷句法都是錯誤的。“在”古有“聽憑”、“由”義，《行記》中的“未間，在長意檢校”即“未送來之前，望經常檢查保護（那些物品）”之意。（212213頁）又如：

孤山高聳，般終南山盤石作四山崖，龕窟盤道，克飾精妙，便栽松柏奇異之樹，可笑稱意。（卷四，會昌五年三月三日）

指出“可笑稱意”即“可愛稱意”，引申可有“非常”、“甚”義。唐代，形容詞轉為甚詞并非個別現象。《校注》本因不明“可笑”一詞的意思，遂標點為：“便栽松柏奇異之樹，可笑。稱意，……”并注釋云：“‘可笑’是圓仁這派人認為可笑，‘稱意’是指武宗稱心合意了。此處諷刺之意甚明。”蓋誤。（276～277頁）

二

專書研究的一個形象說法是“解剖麻雀”，即對各時期有代表性的專書作窮盡式的研究，從一個個的典型來觀察古白話詞彙的面貌。專書研究最基礎的工作是對書中的語言現象進行共時靜態描寫，繼而在共時靜態描寫的基礎上探討其所以然，進一步揭示其形成原因或規律。《研究》一書堪稱這方面研究的一個楷模，志翹先生以敏銳的觀察力和創造性的思考對《行記》的詞彙分門別類加以分析和綜合，實事求是地描述了其所用詞彙的性質、口語詞的來源、詞語的結構和詞義的變化。其對《行記》中詞彙的研究不僅僅限於一詞一義的詮釋上，而是從整個漢語史的角度出發，將其看成是整個詞彙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從結構、意義、詞性、語序和修辭等各個方面進行綜合研究，通過對《行記》一書的研究，揭示了漢語詞彙發展的特點和脈絡。

《研究》的第三章指出《行記》的詞彙“帶有一種混合詞彙的性質，即包括：雜入的日語詞彙；公文套語中的文言詞彙；唐代的口語詞彙”。三者之中“占主導地位的還是唐代口語詞彙，這也正是《行記》一書作為中古漢語研究語料的價值所在”。考慮到《行記》屬日本僧人用漢語寫的文獻，或多或少會受其母語影響，《研究》十分注重鑒別《行記》中受日語影響的詞語，對《行記》全書使用的詞語作了統計分析。據《研究》的鑒別統計，《行記》中受日語影響的詞語約有四十多個。如：

申云：“從戌亥會直流南方，其寬廿余里。望見前路，水還淺綠。”（卷一，開成三年六月廿八日）

指出例中“望見”均為“遠望”、“遙望”之義，與漢語中“從高處、遠處看到”之義不同，而日語中“望見”一詞卻正是“遙望”之義。（69 頁）又如：

有天臺宗和尚法號志遠，文鑒座主，兼天臺玄素座主之弟子，今在五臺山修法花三昧，傳天臺教迹。北臺在宋谷蘭若。先修法花三昧，得道。（卷二，開成四年七月廿三日）

指出“北臺在宋谷蘭若”實為“北臺有宋谷蘭若”之意。“蘭若”乃梵文之音譯，全稱“阿蘭若”，原意為“森林”，意譯為“遠離俗塵的閑靜處”，用以指比丘習靜修行之處，後一般指精舍、庵堂、佛寺。“宋谷蘭若”即北臺的宋谷寺。日語中“在”和“有”是同一詞的兩個義位，圓仁受母語影響而將“有”寫成了“在”。志翹先生還就此對成尋的《參天臺五臺山記》和慧超的《往五天竺國傳》等書中的同類失誤作了指正，認為“這也提醒我們在研究、利用外國人所撰漢文文獻時必須謹慎從事”。（72～73 頁）

《研究》在指出《行記》中雜有受日語影響的這類語言現象的同時，還進而分析了其形成原因和在《行記》一書中的分布情況，認為圓仁入唐初期尚未能熟練運用漢語，往往“筆言通情”，故《行記》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受日語影響的詞語和語法現象較多。《研究》還將《行記》第一、二卷與第三、四卷中的詞語作了對比研究，發現第一、二卷中使用的有些詞語不見於第三、四卷，第三、四卷中使用的有些詞語亦不見於第一、二卷中，認為第一、二卷與第三、四卷可能是圓仁在不同時期所撰，也可能是圓仁回國後經過修改、整理的部分內容與未經修改、整理的原本部分內容的合成。（31～32 頁）

《研究》着重考探了《行記》中出現與使用的大量口語詞，設專章考釋了“拜年”、“本貫”等 200 多個新詞和“慚愧”用于

句首，帶有感嘆意味，表“真幸運”和“謝天謝地”義、“大家”的“衆人”和“大伙兒”義等 120 多個新義，進而指出《行記》中的新詞新義大多爲雙音詞。“從而可以證明，到晚唐時期，新產生的詞語是以雙音化詞語爲主要形式的”。“新詞、新義中大多數是口語詞、口語義，而且大多爲後代所傳承，有不少一直到現代漢語中還充滿活力”。（148 頁）《研究》考釋《行記》中的這些新詞新義注重從不同平面和不同層次進行立體的分析，廣徵博引，多方面多角度進行辨析，既有共時的描寫，又有歷時的探究。如釋“椅子”一詞，指出“椅子”、“椅”（作爲“有靠背的坐具”義）這個詞的出現，歷來認爲從唐代始，但字寫作“椅”的卻一直沒有真正屬於唐代的用例。宋黃朝英《靖康緬素雜記》卷三“倚卓”條所言“椅”、“桌”得名于動詞“倚”、“卓”，甚是。然“倚”乃常用字，爲了與動詞義區別，遂以當時已不復使用的表木名之“椅”來記錄，這一寫法絕非始與宋，實見于晚唐。《漢語大詞典》“椅”之始見例爲宋朱熹《論語集注》引程頤的話，“椅子”之始見例引南唐尉遲偓《中朝故事》。前者時代上比《行記》晚一個多世紀，後者則比《行記》晚將近一個世紀。認爲“值得注意的是《行記》一書中寫作‘椅’的這個詞即出現五例，可見當時已使用得非常普遍”。又引《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迹釋錄》第一輯所載大漢乾佑二年己酉（949 年）的文書資料證唐代其他文獻中也有“椅子”連用的例子，從而確定《行記》中的“椅子”、“椅”當是目前見到的最早文獻用例。最後還聯繫到柯嘉豪《椅子與佛教流傳的關係》一文，指出“值得一提的是：據柯嘉豪先生考證，‘椅子’的產生與佛教的流傳有關。無獨有偶，目前看到的最早在文字上寫成‘椅子’、‘椅’的文獻（如《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及上引敦煌文書）也與佛教有直接關係，這也許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證明柯先生的觀點”。又如《行記》中的“街鋪”、“口鋪”之“鋪”乃衛士警戒之所。《漢語大詞典》

“鋪”下失收此義項，《研究》指出“鋪”本有“驛站”、“驛店”義，引申而有“關卡”、“哨所”義。唐制，兩京城中有街鋪，傍城有助鋪，各捉、道有守鋪。引《和名類聚鈔》和《新唐書·百官志》來說明，又引王建《送裴相公上太原》詩、《唐律疏議》和《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等為例證。（137 頁）

《研究》還注意抓住《行記》中呈現的一些語言現象探源溯流，在靜態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縱向的歷史比較和動態分析。通過比較不同時期漢語現象的異同，來把握漢語詞彙的歷史發展。如指出“《行記》一書中的口語詞十分豐富，細加分析，它們不完全是屬於同一平面的。就其來源，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源于漢譯佛典；二是源于唐代公文、書儀；三是源于活躍在晚唐社會各領域、各階層的新詞、新義”。認為漢譯佛典的早期主譯者大多為外國人，他們一般都是首先熟悉所學語言的口語。“這不僅使漢譯佛典保存了各個時期的口語資料，同時也通過佛教的廣泛傳播有力地促進了漢語口語化的發展”。（149 ~ 150 頁）《研究》指出《行記》中不少口語詞都可以在漢譯佛典中找到源頭。如“觀看”見于東漢失譯《大方便佛報恩經》和吳支謙譯《撰集百緣經》；“建立”見于劉宋罽賓國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等。有些口語詞則源自當時的公文書信用語。如收釋唐宋時代禪宗著作里的詞語的《禪宗著作詞語匯釋》一書中“珍重”條說《詩詞曲語辭匯釋》卷六已指出“珍重”可作臨別時語，唯舉證皆詩句例，故補舉《五燈會元》和《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的散文用例^③。《研究》則指出“‘珍重’為‘保重’義，常用作道別之詞。六朝已見用例，‘珍重，珍重！’用于文末或語末，唐代書儀中習見”。又舉敦煌文書《新集書儀》和《書儀鏡》為證，可見此佛教僧尼常用的道別詞實際上是當時源自書儀的口語詞。（174 ~ 175 頁）

三

專書詞彙的研究要將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結合起來，運用統計的方法，以大量的觀察為基礎，通過數量統計總體，揭示漢語詞彙從量變到質變的規律性。專書詞彙材料的定量分析有助於作同一或不同歷史層次的全面綜合比較，進而為把握詞彙發展全過程提供數量依據，以具體的數據和事例來揭示理論和規律。祇有經過細致的計量，纔能就學術界對一些語言現象的不同看法作出具有說服力的判斷。認真進行專書詞彙研究，對第一手語料進行一絲不苟的調查分析，在此基礎上作出科學的歸納和理論上的闡述，這是對漢語詞彙史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工作，也是探求漢語詞彙在各個時期的特點，總結漢語詞彙發展的內部規律的不可或缺的工作。

常用詞是與作為訓詁學研究對象的疑難詞語相對而言的詞語，這些詞語既不同于一般以詞頻統計為依據確定的常用詞，也不同于詞彙學中的基本詞彙的概念，而是代表詞彙的核心，這些詞的發展變化往往可以決定詞彙發展的面貌。因而，探明漢語詞彙發展的軌迹，特別是從上古漢語到現代漢語詞彙的基本格局的過渡，即後者逐步形成的漸變過程，揭示總結漢語詞彙發展的規律，常用詞在古白話中的衍變遞嬗的研究更顯得十分重要。《研究》對足/腳，欲/要，打/擊，著（着）/衣、服、冠，吃/食、飯、飲、餐，看/觀、察、視，邊/側，從/自等常用詞在《行記》中的使用頻率作了統計和比較分析，進而指出“《行記》中雖然沒有發現更多的晚唐新出現的口語性常用詞，但是我們看到一些在六朝甚至更早出現的口語性常用詞，到了晚唐已得到普遍使用。換言之，它的特點是表現在使用的‘量’上。例如：‘腳’與‘足’，《行記》中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口語化的‘腳’；‘打’與

‘擊’，《行記》中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口語化的‘打’；‘着（著）’與‘衣’、‘服’、‘冠’，《行記》中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口語化的‘着（著）’；‘吃’與‘食’、‘飯’、‘飲’、‘餐’，《行記》中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口語化的‘吃’，……”（311 頁）“漢語中一些同義常用詞的口語形式，有的早在漢魏時期已經出現，但從文言形式和口語形式出現的頻率（也就是‘量’）而言，口語形式到了唐代纔有了長足的進展。從《行記》看，一些同義常用詞中，口語形式佔了絕對優勢或達到了完全替代文言形式的地步。”（225 頁）

《研究》第五章在論述《行記》中所見詞彙的發展變化時說，“在《行記》中出現的新詞裏，雙音詞占 90% 以上，而複合雙音詞的數量居于各類構詞法之首，其中尤以聯合式、偏正式複音詞最多。”在指出此是漢語詞彙雙音化過程中的普遍現象後，着重分析了聯合式複音詞中的同素反序雙音詞、支配式雙音詞、補充式雙音詞、加綴雙音詞和多音節詞組凝縮成的雙音詞。

《研究》指出唐以前的文獻中支配式的雙音詞占的比例是較小的，而“在《行記》中新出現的雙音詞中，支配式雙音詞占有較大的比例，這無疑是構詞法的一大進步”。《行記》里構成支配式雙音詞的語素中，還出現了“作”等一些極為活躍的成分。補充式雙音詞比之前代有了大幅度增長，而且種類繁多。其中以構詞能力特別強的“來”為趨向補語素構成的雙音詞凡 59 例，以“去”為趨向補語素構成的雙音詞凡 20 例。《行記》中加前綴的雙音詞雖僅三個，而加後綴的雙音詞則大量出現。《研究》對這些加後綴的雙音詞繼承和發展前代加綴雙音詞之處作了具體的比較分析。《行記》中有的雙音詞是由詞組或語段凝縮而成，《研究》指出“由詞組的凝縮進而詞化，這是漢語詞彙發展中經濟原則的具體體現”，這種現象在漢魏時期已常可見到。如“惡發”乃“發脾氣”、“發怒”之義，其實是“惡心內發”的凝縮形式，

而“惡心內發”在後漢曇果共康孟祥譯《中本起經》中已有用例。(215 頁)

《研究》注意到《行記》里很多雙音節動詞中的一個語素呈弱化的現象，意識到這是這個時期雙音詞的一個顯著特色，對此類詞的虛化狀況作了描述。如《行記》里“相別、相咨、相來、相見、相看、相隨”中的“相”與動詞結合，本可表互相、遞相、偏指等義，而在《行記》中其指代性弱化，由表偏指的“相”演變成爲雙音動詞的一個不表意的構詞語素。又如“着”在動詞“附着”義的基礎上，漸漸虛化爲助詞，《研究》根據《行記》中的語料揭示了“着”由動詞虛化爲助詞的演變過程。(200 - 203 頁)

四

志翹先生勤于讀書，善于讀書，積累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因而在訓釋《行記》的詞語時每每從衆說紛紜中獨辟蹊徑，創立新見，多發人所未發，見人所未見。如釋“不是”說，用“不是”來表示否定判斷，唐代較口語化的文獻中已觸處可見，故王力、志村良治、羅杰瑞等都認爲用“不是”表否定判斷始于唐代，并以此作爲判定“是”成了成熟判斷詞的標準及作爲區分文言與口語的標準。指出荷蘭佛教學家許理和所舉例證中的兩處失誤，并根據其所掌握的資料，舉後漢支婁迦讖所譯《阿閼佛國經》和《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中的用例爲證，將“不是”的首見年代提前至後漢。(152 - 153 頁)又如釋“起居”說，其原是名詞，指人的舉動、行動。凡“奉問起居”、“問訊起居”、“候起居”都是“問候日常生活安好”之意。到了唐代，出現了省略“奉問”、“問訊”、“候”等動詞，以“起居”直接作謂語的情況，這時“起居”的詞性即由名詞轉爲動詞，表“問候”、“問安”、“問好”

之義，在唐寫本《書儀》中這類用例觸處皆是。敦煌變文中還出現了“起居”的後面帶賓語的用例，補正了前人的失誤。（247～248頁）詞和語言的其他要素以及詞和客觀現實之間都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多種多樣的聯繫，如複音化、結構造詞、修辭、佛經多音節轉寫形式等語言現象就都是語音、詞彙、語法等相互作用的結果。《研究》在分析《行記》中的語言現象時往往從語言的語音、詞彙、語法各要素聯繫着手，論述鞭辟入裏。其由音韻闡明詞義的如釋“抹肚”一詞說，唐代始見，“抹”作為動詞表“緊束”、“束縛”之義。“抹肚”的早期寫法為“襪肚”，《廣韻》入聲十三“末”韻：“襪，襪肚。莫撥切”，與入聲十“月”韻：“襪、襪、襪，足衣。望發切”之“襪”為兩字。“襪肚”又可稱“襪腹”、“抹胸”，原似婦人縮服，即指有前片無後片，上可覆乳，下可遮肚腹的內衣。後則男女皆服，如今之肚兜。進而追溯說“抹”、“襪”的更早形式為“陌”、“帕”、“抱”。古音“幷”母、“明”母均為重唇音，而古唇音多可通轉，故為一聲之轉。又如“詣實”一詞乃唐五代常語，為“確實”、“分明”之義，又寫作“指實”。實際上，“詣實”、“指實”也就是“的實”，“的實”亦為“確實”、“分明”義，唐宋常見。指：古音“章”母“脂”韻；的：古音“端”母“錫”韻。上古音“章”母歸“端”，“指”“的”雙聲；韻部“脂”“錫”為旁對轉關係。故兩字得相通。“詣”、“指”又均從“旨”得聲，故亦得通。《廣韻》入聲二十三“錫”韻：“的，指的。”可見“指的”乃同義複用，又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五二：“適，指實也。”卷五三：“適，的。”可見“指的”、“指實”同義。“指的”也為“分明”、“確實”之義，六朝已見。“指的”又作“之適”。的：“端”母“錫”韻；適：“書”母“錫”韻。“書”為“審”母三等，上故音近“端”，故“適”、“的”音近，可相通假，“指適”亦為“分明”、“確實”義。（220－225頁）其由語法闡明詞義的如釋“委曲”

說，其本是“彎曲”、“曲折”義，爲形容詞性的同義複詞。當其用于“細微”、“詳盡”義而處于主語或賓語位置時，即發生語法引申，成爲名詞，表“事情的原委”、“底細”義，從而又引申出“文書”、“手札”義。又如釋“見”和“聞”的互通現象時指出“通感”具有修辭色彩，是拿一種感覺去比擬另一種感覺，兩種感覺間有一種聯想關係，而“見”和“聞”的這種用法卻是本來專表某種感官功能的詞意義範圍擴大，兼帶了另一種感官功能，它們之間不存在比擬、聯想的成分。這正如筆者曾說到表示心理感覺的幾個語義場也不是完全可以互通的。如表聽覺的“聞”可表嗅到，而表嗅覺的“嗅”則不可表聽到^①，有些通感現象或許還得從詞義本身來進行探索。志翹先生于此亦獨到地從詞的相互影響引起的詞義變化着眼，指出“其實，‘見’與‘聞’的互通應源于‘聞見’、‘見聞’的經常并舉，兩詞詞義互相滲透所致。”（242頁）

《研究》根據《行記》中的新詞和新義補正了《漢語大詞典》詞目漏收、例證過晚、釋義錯誤等多達 300 多例，除在第四章對《行記》中的新詞新義加以考釋外，還在第六章設專章就《行記》中疑難詞語作有考釋，所釋言之有據，勝義迭出，補正成說頗多。如釋“劍輪”說，此詞最早見于漢譯佛典，從文獻用例來看，“劍輪”當是一種人工制作的，可以飛擲出去傷人的，遍施鋒刃的輪狀武器，大致可以看作是冷兵器時代的一種中程武器，補正了小野勝年等的說法。又如釋“空”說，對《行記》中“空飯”一詞的詮釋，歷來注家意見紛紜，往往不能自圓其說，均有不夠周全處。認爲“空”有‘僅僅’、‘單獨’之義，《行記》中的“空茶”、“空飯”之“空”當爲形容詞，乃“清茶”、“白飯”之義。不過，這祇是主人邀客時爲了表示謙遜的說法而已。

五

語言的系統研究是一個國家文化建設的重要方面。語言是—定社會和歷史的產物，研究語言必須具有史的觀念，遵循科學歷史主義的原則。詞語的產生、詞義的引申和演變都是基于—定社會背景而出現的歷史現象。漢語史的研究祇有將歷代文獻中的語言置于特定歷史階段上加以認識、比較、分析，纔有可能較為準確地探明詞義，發現規律，解決有關問題。語言的系統研究包括共時系統研究和歷時系統研究。歷時研究有賴于共時研究的成果，共時研究又必須以斷代的語言描寫為基礎，而斷代的語言描寫離開了專書的研究則無法進行。因此要在漢語史研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必須對歷史上的一些重要著作從語言學角度做比較詳盡的研究。當前系統而有選擇地對我國一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獻、著作進行專書研究，已成為我國文化發展戰略上的一個重要方面。這項工作對於在歷史新時期中在更高層面上更大規模、更全面系統地開展我國的文獻研究、語言研究和文化建設，適應當今和未來文化科技發展的需要具有不言而喻的深遠意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專書詞語反映了語言發展演變過程中的某種典型性特徵，具有特殊的文化價值。統一規劃專書詞語的研究，將使專書詞語的研究形成一個互補的有機整體，從而更充分地發揮其在漢語史研究中的作用。因此，我們面臨的任務是選擇和確定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專著，兼顧各個歷史時期、各種文體、各種內容，形成系統的專書研究系列，從而為編纂各個時代的斷代詞典和反映詞語古今演變的歷史性大詞典奠定厚實的基礎。

志翹先生的《研究》一書已為我們進行更多的系列專書研究提供了一個楷模，誠如魯國堯先生在為《研究》一書寫的序中所說，“志翹之書是可傳之作”，自當有增印再版的機會。書中論及

“嵐風”一詞時說到“嵐”字則早見于漢譯佛典，慧琳《一切經音義》、希麟《續一切經音義》中都已言及。據筆者所見，玄應《一切經音義》中亦已言及，如：

婆嵐：“力含反。案：諸字部無如此字，唯應璩詩雲‘嵐山寒折骨’作此字也。”（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大般涅槃經》第四十卷）

吠藍婆嵐：“舊經中或作毗嵐婆，或作鞞藍，亦隨藍，又作旋藍，皆梵之楚夏耳。此云迅猛風也。”（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二，《瑜伽師地論》第二十七卷，此條慧琳《一切經音義》收錄在卷四十八）

吠嵐婆：“力含反。案：舊經論中或作毗藍婆，或言旋藍婆，又作鞞嵐婆，或作隨藍婆，皆梵之楚夏耳。此云迅猛風也。”（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四，《阿毗達磨俱舍論》第二十二卷，此條慧琳《一切經音義》收錄在卷七十）^⑤

上舉玄應《一切經音義》中“嵐”字例，曾良先生《“嵐風”小考》和何亞南先生《釋“嵐”》等文均未提及，似可于增印再版時補入，或可有助于對此詞的探討。

魯先生在評閱志翹先生的博士論文時曾說，其“與圓仁若冥冥之中有默契者”。我亦有這種感覺。千年之前，圓仁毅然入唐求法，十餘年間堅韌不拔，孜孜不倦，終成一代高僧。千載之下，志翹先生與其于冥冥之中若有默契，撰成此書。其所相默契者，實為一種鍥而不舍的精神。這種精神也就是魯迅先生用以自勉并以之與國人共勉的真正民族脊梁骨所內蘊的精華之所在，此是志翹先生此書在學術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功之根源所在，亦是我輩于學術研究的漫漫征途上不斷上下求索之永恆的精神動力。我想，讀此書諸君當亦會有此同感的。

〔參考文獻〕

呂叔湘 1983 文言與白話，《呂叔湘語文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董志翹 2000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彙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注釋〕

①梅維恆 (Victor H. Mair) 說：“文言和白話實際上屬於完全不同的語言範疇，前者是一種遠離言語的半密碼，後者跟活的漢語的口頭形式具有緊密的一致。”又說：“語言資料表明，文言和白話從它們能被追溯到的時代起，一直就是兩個有區別的系統。”見 Victor H. Mair, “Buddh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ritten Vernacular in East Asia: The Making of National Languages” (《佛教與書面白話在東亞的興起：民族語言的形成》),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 no. 3 (August 1994), p. 708。

②指白化文等校注本，下同。

③袁賓《禪宗著作詞語匯釋》，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245 頁。

④參拙著《古白話詞彙研究論稿》，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345 頁。

⑤叢書集成本玄應《一切經音義》109、1010 和 1118 頁。

(徐時儀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郵編 200234)